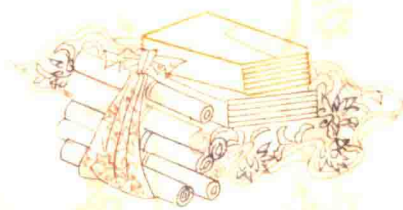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馆 编

遗我双鲤鱼

书札里的吴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遗我双鲤鱼

书札里的吴门



上海博物馆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我双鲤鱼：书札里的吴门 / 上海博物馆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博物新知丛书)

ISBN 978-7-301-28610-4

I. ①遗… II. ①上… III. ①书画家—书信集—手稿—中国—明代 IV. ①J292.26

②K820.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4176 号

- | | |
|-------|---|
| 书 名 | 遗我双鲤鱼——书札里的吴门
WEI WO SHUANGLIYU |
| 著作责任者 | 上海博物馆 编 |
| 主 编 | 杨志刚 |
| 策 划 | 陈曾路 |
| 统 筹 | 高秀芹 |
| 责任编辑 | 梁 勇 |
| 特约编辑 | 顾 婧 |
| 书籍设计 | 曹文涛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610-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联城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313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录

- 004 信札和艺术史研究
白谦慎
- 018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信札研究数题
孙丹妍
- 034 尺牍小析
袁媛
- 048 书信中的图画与图画中的书信
黄小峰
- 082 罗纹笺小考
何炎泉
- 098 明代信札中的吴门文人生活
薛龙春
- 130 吴门诗牋及其背面
陈正宏
- 142 唐寅与文徵明交游考略
毛秋瑾

-
- 162 从“南京解元”到“黜充吏役”
——再谈弘治己未春闹舞弊案与唐寅
谈晟广
- 206 稽古斯在——文徵明尺牍所见文人雅事
潘文协
- 228 谏论明初至前文彭时代吴门文人对印章的艺术追求
陈道义
- 238 书斋里的闲雅
——兼及明代吴门文人的日常生活美学
邱文颖
- 256 易代之选中的吴门墨影
——略论清人对明代手札之收藏与摹刻风尚
李军

遗我双鲤鱼

书札里的吴门



上海博物馆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录

- 004 信札和艺术史研究
白谦慎
- 018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信札研究数题
孙丹妍
- 034 尺牘小析
袁媛
- 048 书信中的图画与图画中的书信
黄小峰
- 082 罗纹笺小考
何炎泉
- 098 明代信札中的吴门文人生活
薛龙春
- 130 吴门诗牘及其背面
陈正宏
- 142 唐寅与文徵明交游考略
毛秋瑾

-
- 162 从“南京解元”到“黜充吏役”
——再谈弘治己未春闱舞弊案与唐寅
谈晟广
- 206 稽古斯在——文徵明尺牍所见文人雅事
潘文协
- 228 遴选明初至前文彭时代吴门文人对印章的艺术追求
陈道义
- 238 书斋里的闲雅
——兼及明代吴门文人的日常生活美学
邱文颖
- 256 易代之选中的吴门墨影
——略论清人对明代手札之收藏与摹刻风尚
李军

信札和艺术史研究

白谦慎

2017年8月至10月，上海博物馆举办“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展”，这是继上海图书馆于2013年举办“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精品展”后，上海文博系统推出的又一个中国古代信札展览。此次展览共展出明代苏州地区的王鏊、李应祜、沈周、文徵明、唐寅、吴宽、王宠、陈淳、张灵、王世贞等数十位著名书画家的手札数十件，内容涉及广泛，对了解明代吴门书画家的生活环境、艺术创作、审美趣味以及书法风貌，都十分珍贵。我本人虽然并不涉足吴门艺术，但在研究明末清初和晚清艺术史时，经常使用信札文献，故借此机会，谈谈信札与艺术史研究的关系。^{〔1〕}本文包括以下内容：一、信札的文献学意义（包括信札的收藏与出版）；二、艺术史学者信札研究简述；三、亟需培养具有信札整理和研究能力的年轻学者。

一

中国古代文人十分重视信札的交流功能。16世纪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来华传教，发现中国文人特别注重书面语，因此喜欢写信，即便是住在同一个城市、路程很近的朋友，也常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2〕}虽然历代战争动乱不断，仍有数量可观的信札存世。文史工作者也一直十分重视这部分文献。^{〔3〕}民国时期，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影印了不少清代名人信札，许多和艺术史相关。上海的前辈学者顾廷龙先生在其所编《吴宪斋先生年谱》中，就使用了许多吴大澂（1835—1902）及其师友如陈介祺（1883—1884）、翁同龢（1830—1904）等的信札。顾先生在担任合众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格外留意古代信札的征集和收购，使今天的上海图书馆成为收藏古代信札的重镇。前几年，晚清名宦张佩纶（1848—1903）的后人将张佩纶致友朋信札4800通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又为该馆的古代信札收藏锦上添花。顾先生在世时,十分重视馆藏信札的整理和出版,出版了《艺风堂友朋书札》《汪康年师友书札》等点校本信札集。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辑的《历史文献》至今已经出版了十馀辑,每辑都用相当大的篇幅刊登经过校点的馆藏信札,成为我们了解上海图书馆收藏信札的一个重要渠道。〔4〕

信札收藏数量可观并致力于整理出版的机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该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盛氏愚斋往來函牍》万馀通。王尔敏、陈善伟先生从六百馀名家手书中,精选重要人物一百位的一千七百馀通信札,编为《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9册,影印出版。另有一册彩色印刷的《近代名人手札》十分精美。此外,王尔敏先生等还整理了《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3册。近期,该馆计划将盛宣怀信札全部整理出版。

进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以后,信札的公布、出版、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2002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编辑的《清代名人手札汇编》(10册)。2002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6册),收录400位明代重要历史人物(如徐光启、严嵩、文徵明、吴宽等)的信札。杨臣彬先生和陈智超先生为信札做了释文。同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8册)。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了明代名人尺牍选萃(12册),可谓皇皇巨制。其可称道者,是将晚清民国出版的一些尺牍影印出版(其中一些今日已经见不到原作),不足之处是没有释文,且将《尺牍新钞》一类的刻本也悉数收入。最近,梁颖根据馆藏《国朝名人手札》30册,即上海图书馆藏庞元济旧藏清代信札260家581通,整理为《庞虚斋藏清朝名贤手札》,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对研究清代的书法和笺纸也很有价值。此书不但有可靠的释文和写信者的考证,梁颖先生所著《前言》,长达二万馀言,是一篇十分难得的深入研究清代信札的论文。

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不但竞相出版影印的明清稿本信札,还扫描馆藏的部分信札上传到馆内网站。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布的信札最多,以我研究的吴大澂为例,国家图书馆的数百通吴大澂信札基本已有缩微胶卷。但许多缩微胶卷制作的时间较早,质量不佳,有些色笺上的信札,字迹难以辨认,影响了阅读的准确性,亟需扫描原件来替换陈旧的胶卷。上海图书馆也扫描了四大册《恽斋家书》和吴大澂的信稿和电报稿,在馆内的电脑可以阅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四万通信札也基本扫描完毕,正在逐步上传院内的网络,研

究者可以在电脑上阅览。这些都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只是，许多博物馆和图书馆尚未全部公开所藏信札。但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博体系的逐步开放，普通读者能够接触这些信札文献的时日可以期待。

民间收藏信札在近年来也有不断升温的趋势。市场上流通和拍卖会出现的古代信札很多，虽然没有人做过完全统计，几万通起码应该是有的。也就是说，由于文物市场的活跃，大批隐匿于民间的信札，突然面世了。当它们再次进入私人手中，即使藏家秘不示人，也已经留下了流通的线索和痕迹。上世纪90年代，国内刚有拍卖会时，拍卖图录的制作，多是先拍反转片然后印刷，成本相当高。所以，很多信札册页通常只拍摄其中几开，图录里也只印出这几开，使我们难窥全豹。如今有了数码照相机，拍摄便利，成本大为降低，很多拍卖公司都将整本整本的信札册页在图录中印出，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研究。也有一些收藏家，着力收藏古代信札，如台北的何创时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何国庆先生）近二十年来，专注于收藏明代和民国时期的信札，数量相当可观，并出版了《明代名贤尺牍》这一重要的研究著作。

由于中国古代信札常常被作为书法作品来收藏，欧美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也有信札，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八大山人（1626—1705）致方士琯（1650—约1711）书札册，是研究八大山人晚年生活和书法的重要资料，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信札收藏最具规模的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明代信札存世并不多，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居然藏有晚明四百多人写给同一收信人方用彬（1542—1608）的信札七百餘通，堪称奇迹。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陈智超先生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对这批信札做了细致的研究，完成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将这批信札和对它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陈先生为此书撰写的近二万字的长篇导言，详细地介绍了他研究这批信札的具体步骤，如怎样认字、认人、认时、认地、认事，^{〔5〕}对研究和使用的古代信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十馀年来，我在为研究生讲授中国书画文献课时，涉及信札研究的部分，总是以此文作为最重要的阅读材料。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信札，时间跨度最广，从晋代到清代的信札都有。其中唐摹本王羲之《行穰帖》、宋代米芾的《岁丰》《逃暑》《留简》三札、赵孟頫、管道升等作《赵氏一门书札》等，早已被研究者所熟知。但该馆还藏有数量可观的明清书札，除了我在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举

办的一个书法展的图录中讨论过大约十通外，^{〔6〕}至今还没有被系统地整理和出版过。我曾向有关人士建议，在适当的时候，邀请研究明清信札的学者整理这批信札。

在近年来的古籍整理中，许多稿本信札和著录中的信札，都在释读标点后收入各种文集中。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傅山全书》增订版，收傅山致友人信札一百八十馀通。^{〔7〕}沈津先生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也收了翁方纲致一百多个友人的五百馀通信札。近年来，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陆续出版了不少他们整理古代书札的成果，如余彦焱、柳向春整理的《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等，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在古代信札的出版和收藏日益兴盛的同时，研究中国古代书信文化的著作也逐渐增多。在书仪的研究方面，周一良和赵和平合著的《唐五代书仪研究》，早已成为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在西方，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德裔教授 Antje Richter 女士，在四年前出版了中国中世纪早期的信札与书信文化的英文专著，^{〔8〕}可视为西方学者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努力。此外，科罗拉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曾举办过中国古代信札的学术研讨会，只不过侧重点多在文学史。

近二十年来，古代信笺研究也颇具成果。美国田纳西大学艺术系的 Susanna Wright 教授在2001年于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1626年出版的彩色套印本《萝轩变古笺谱》的。^{〔9〕}此谱是现存最早的装饰笺谱，共有178张图像，分16个主题，展示了使用复杂的印刷技术制作的精美图案。美国科学家 Thomas Ebrey 和他的妻子、著名汉学家伊佩霞（Patricia Ebrey），多年来收藏中国书画，对中国艺术有广泛的兴趣。Thomas Ebrey 近年来对中日版画（包括印刷的笺纸）很有兴趣，曾撰写过《十竹斋书画谱版本考》一文。^{〔10〕}上海图书馆的梁颖先生在2010年和2012年先后出版了两本书，详细介绍信笺的历史、工艺工程、各种精美的信笺的样品，可以被视为近年来研究笺谱的最重要的著作。^{〔11〕}

以上所述，仅为信札出版和收藏的简略回顾。限于篇幅，囿于所见，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还请读者谅解。

中国早期的法书名迹，大部分是以信札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北宋初年刻拓《淳化阁帖》后，宋代就已有人对《淳化阁帖》所收二王名下的法书做了考释和研究，这是较早的信札和艺术历史发生联系的例子。在当代，东瀛同道对丛帖中古代法书、传世唐摹本法书、西北新出土的尺牍做了很多的考订研究工作。长期在日本学习工作、目前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的祁小春教授的王羲之研究，在广泛汲取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拓展和进境。他的《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王羲之〈十七帖〉汇考》等，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大动乱，唐人留下的尺牍不多，但存世的宋人尺牍数量可观。宋代书法史的专家曹宝麟先生，对北宋尺牍的考订达到了十分精湛、引人入胜的地步。^[12]在这些学者的著作中，古代尺牍既作为艺术品被研究，它们同时又为研究古代艺术提供了历史文献。

虽然存世的明清信札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元，但在二十年前的艺术史研究中，有规模地使用信札来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却并不多见。^[13]这应该和这样一个历史变迁有关：在宋之前，行草书法的主要形制就是信札，至少留存下来的古代书法墨迹如此。在明清时代，非信札类的书法卷轴册逐渐成为书法的主要形制，信札虽然还被视为艺术品，但它们不再像过去那些主要依靠书法价值而被后世收藏的信札那样备受关注。我们不妨从艺术史文献学领域中的标杆性人物汪世清先生开始，来观察信札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发展状况。汪世清先生使用的文献种类很多，主要有文人的诗文集（此为大宗），书画作品及其题跋、著录、地方志、家谱、族谱、印章、印谱等。对于书信，汪先生所用除了诗文集里所收书信，也有书信集，如周亮工的《尺牍新钞》和张潮的《友声集》等，亦即多为刻本信札。稿本信札汪先生用的并不多。在我和薛龙春主编的《汪世清辑珍稀明清艺术史资料集》（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收有汪先生辑录的《各家尺牍》抄本一册，内容多从《尺牍新钞》《尺牍新语广编》和一些文集中辑录而来，稿本信札仅为1942年珂罗版的潘厚辑《明清画苑尺牍》影印的数通。汪世清先生之所以尚未广泛地使用稿本信札文献，与过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许多稿本信札没有整理和编目、借阅不便有关。汪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国的拍卖初具规模，许多书札尚未在文物市场上出现。但是，汪先生对稿本信札的文献价值无疑是十分重视的。^[14]他是研究八大山人的专家，对存世的八大山人信札一直很注意。1990年代后期，汪世清先生应邀到台湾做研

究。他在何创时基金会发现了一通八大山人的无上款信札，他对这通信札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书八大山人草书尺牋后》一文，考证出此乃八大山人致石涛的信札，重要意义不言而喻。^{〔15〕}在此文的一开始，汪先生便讨论了存世八大山人稿本信札，并引用王方宇先生的统计，以为存世八大山人信札有39通（加上何创时基金会所藏，共40通）。不过，此时我已在上海图书馆见到八大山人致海翁的信札册，共有12通。2000年12月，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八大山人全集》将这一信札册全部影印发表。汪先生是此书的顾问，应该在2001年就见到了这批信札。只是他那时身体已经不太好，在2003年去世前，还没有来得及对这批信札进行仔细研究。

2001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付梓前，陈先生请汪先生审读，出版后汪先生专门撰写长文，对陈先生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对信札中反映出的徽州儒商方用彬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汪先生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这731通手札既是一部明人书信集，又是一件明人书法集锦册，还是一册明人印谱，内容丰富，极富史料价值。特别是经过著者多方搜集‘资料’，据以对这批手札一一作出‘考释’，使这一钜制的内容更加充实，足以启发和促进对这批信札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可以肯定，这一钜制的出版，对促进徽州学研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因而著者对这批手札的‘考释’，堪称开创性的研究，是徽州学研究以至明史研究的一次创新。自然对促进徽州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16〕}

汪先生主要从徽学的角度谈论陈智超著作的意义，其实这部书涉及的面很广，对研究晚明的文化史和艺术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出版之后，已有学者使用其中的资料，讨论了晚明的篆刻和艺术赞助。这部书中还有很多研究课题可以挖掘。陈智超先生本人曾对我说过，他计划在考释的基础上，写一本讨论晚明儒商方用彬的专著。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陈先生这一计划是否还在进行。

海外学者对信札在研究艺术史中的重要意义也有透彻认识。高居翰先生在其《画家生涯》一书中指出，正式的文本常常不能为研究中国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和创作情景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他写道：“中国作者，不论过去的还是现代的，少有例外，都小心谨慎地避开讨论这些问题，觉得如果承认它们是画家十分关切的事务，便会贬低那位画家的身份。经济因素就是这样被排除在记述画家的文字以外，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对性避而不谈，作者对画家们的日常

生活有足够的认识，但他们觉得在书中不便提及。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必须从正式作品以外的零星材料——如信笺、日记、随笔以及少有表露内情的题识之中重新发掘。”^{〔17〕}

无论是了解一个艺术家的理论观点、风格形成，创作动机，还是研究鉴定、收藏史的历史来说，信札能提供更为具体、真实（并不是说其中没有修辞的因素）的信息，因此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上海图书馆藏有乾嘉时期大儒阮元（1764—1849）致陈文述（1771—1843）一册十四札，其中一封附上了自己被后世所熟悉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并提到这两篇文章曾由罗桂芳（？—1814）持示成亲王永瑑（1752—1823），成亲王一方面为之摇首，不承认北碑胜过南帖；另一方面，自从读了二论之后，便不再写欧字，“骤变而写虞”。而另一位曾经学虞的书家高邕，很可能在阮元的劝告下，改学欧、褚。在这信的后半部分，阮元指出今日北派书法，只有高邕（1769—1839）天分学力足以名家。高邕今日无闻，其人传世作品无论临摹还是创作，都是我们熟知的名家范围，与后世所理解的北碑无关。可见，阮元所说的北派，其重心并非晚清所艳称的魏碑，而是唐碑。^{〔18〕}一通信札居然可以廓清多年来人们对阮元书法理论的误解。

2005年夏，上海某拍卖公司拍卖王时敏致王翬信札七通，被海上收藏家枫江书屋主人购入。王时敏（1592—1680）和王翬（1632—1717）都是画史上的重要人物，此卷信札涉及的人物多达十八位，社会文化背景多元复杂：既有遗民画家王鉴（1609—1677）、明朝显宦赵士春（1599—1675）、江南大儒陆世仪（1611—1672），也有贰臣诗人吴伟业（1609—1672）、贵戚收藏家王永宁（？—1672）、当红画家王翬、享有盛名但却潦倒的“南曲天下第一”苏昆生（约1605—1679）。其话题涵盖了王时敏家族的经济状况、收藏转让、与太仓及周边文人、艺术家之间的交往等等，内容之丰富在明清信札中亦不多见。十二年来，我和章晖女士一起，从不同的角度仔细研究了这七通信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之一便是王永宁研究。^{〔19〕}王时敏在信札中屡次提到“王长翁”，即吴三桂（1612—1678）的女婿王永宁。长期以来，研究收藏史的人们都会从一些书画名迹上王永宁的印章知道清初有过这样一个收藏家，但对他的身世却不甚了了，也无人知晓他和王时敏之间曾经的密切交往。我们的研究显示，王永宁是清初一位非常活跃的大收藏家，也是拙政园的主人。晚年的王时敏结交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新贵，对其极尽阿谀奉承之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折射出了以王氏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阶层在入清后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复杂性。没有这批信札，我们很难想象王永宁这个暴发户在当时的江南文化圈的影响力。

稿本信札不但可以提供大量板刻书籍没有的信息，还常常可以纠正书本中的记载。上海图书馆藏有王懿荣（1845—1900）于1870年代初写给他的老师、京师文坛祭酒潘祖荫（1830—1890）的信札两册，收录的信札对研究当时京师的收藏圈极有价值。当时王懿荣在北京供职，年纪虽轻，但嗜收藏，精于鉴定，在京师的收藏圈十分活跃，不少官员请其掌眼。潘祖荫因公务繁忙，多倚重王懿荣为其奔走，打听古董的消息。1872年，王懿荣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向潘祖荫报告青铜器的市场行情：

顷自敝还，真兴尽而返也。松竹合有字无字六七器，以重值归西人。（含英与之通消息，亦云不错。铜价一时烽起。昨尚与之酬酢，只此一宿，光景变局如此。）……西人医士某（布姓），今日计收器至千餘金，有字无字一气合卖，并古泉亦收。前伪盘五百餘字之伪物，既归聚和成，闻清閼又加价买回，以待西人。然松、筠各器仅存此数物，尚非上上品，而又为西人豪夺。从此并拓本亦不得有，真可浩叹也。要急，恐其居奇；而稍涉观望，又入外夷。^{〔20〕}

信中之“敝”乃“廠”之异体，指琉璃厂，“松竹”“含英”“聚和成”“清閼”皆古董铺名。王懿荣告诉潘祖荫，他刚从琉璃厂逛了一大圈回家，一位姓布的西方医生正在大力收购青铜器，以致于青铜器价格一夜之间飞涨，有的店铺甚至把已经卖出的假货“加价买回，以待西人”。此时，在京的官员收藏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急于购买，古董铺势必趁机漫天要价；而稍有迟疑，东西又将被西人购走。从收藏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王懿荣的这通信札见证了西方收藏家最初介入中国市场带来的震动和当时官僚收藏家的焦虑。

信中所言布姓医士，即英国医生 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中文通常译为卜世礼。卜世礼在1868年获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前往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并兼任京师同文馆医学教习。^{〔21〕}卜世礼确实买下了王懿荣在信中提到的五百多字铭文的伪作“晋侯盘”，后捐赠给了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馆。卜世礼在撰写《中国艺术》（Chinese Art）一书时，也用了“晋侯盘”的例子，并说他曾就此盘向潘祖荫咨询过，潘认为是真品。^{〔22〕}王懿荣的信札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潘祖荫当时向卜世礼撒了个谎。潘这样做，或是为了保护那个卖假货的古董店；或是潘祖荫语焉不详，卜世礼拉出潘为自己购买的古董背书。有了王懿荣的这封信，我们可以确知，Bushell 著作中引用的潘祖荫的意见并不可靠。

对于艺术史研究而言，稿本信札的文献意义毋庸置疑。但是，目前使用这种文献来进行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并不多。究其原因，固然有不少博物馆和图书馆没有完全公开自己的信札收藏的因素，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熟练地掌握使用稿本信札来进行艺术史研究的技能也并非易事。高居翰先生虽然曾呼吁使用信札、日记等文献来研究艺术社会史，但他的著作中却极少使用这方面的文献。柯律格先生的著作《雅债：文徵明的社交艺术》征引文献甚为丰富，但所引文徵明的信札，多为周道振先生点校的《文徵明集》中所收的信札释文，其他存世的文徵明信札尚多，^[23]或无缘见面，或是见面也依然存在一个能否使用的问题。

以这两位欧美学者的著作为例，绝无苛求之意，只是为了说明，重视信札的文献意义和能够使用信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技能问题。许多母语为汉语的学者，也并不能熟练地释读信札，遑论欧美学者。在近年来出版的某些整理古代信札的书籍中，释文准确率不高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当一通信札被作为关键的史料予以引用时，如果结论建筑在错误的释文之上，那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近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呼吁重视稿本文献整理的准确性，^[24]就是针对古籍整理的这个薄弱环节而发的议论。

由于目前许多年轻一辈研究人员在释读行草信札时候的能力有限，综合性大学的古文献专业和美术院校的艺术史专业也很少有相关方法的课程，这就使得信札在各个领域（不仅仅是艺术史领域）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要有效地利用信札文献，需要具有识字，考订人物、故实，为信札系年的能力。识字部分，最重要的是要熟悉行草书，除了读一些草书的名篇和查看《草字编》之类的工具书外，参考他人的信札释文也是很好的练习，因为直接读稿本信札，有利于熟悉信札的书写格式和惯用语，熟悉由于个人书写习惯造成的行草书种种不规范的变体。在近年来出版的某些信札研究著作或是公私藏品图录，释文做的很好，为初学者学习释文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途径。以下列举几本。

前面提到的陈智超先生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提供了甚为准确的释文。明代人的信札通常比清朝人的更难读，陈先生深知释读不易，错误在所难免，特意在第三册影印所有信札，便于读者在有疑问时进一步核查。

何创时基金会 2013 年出版的《明代名贤尺牍集》，收录基金会所藏的明